

我的“耙耳朵”父亲

□甘元俊

小时候,“耙耳朵”一词在川东一带十分流行,它泛指一个家庭当中夫妻之间,当不了家或者说不起话的其中一个人,尤其是在农村,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,通常男性比较多。“耙耳朵”一般只有平辈人才可以这样叫喊,也是男人与男人之间,在工作或生活中相互调侃或取乐的一味“调味剂”。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在我的印象里,别看我的父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,全大队一千多人的穿衣吃饭问题,他都可以管理得有条不紊,唯独在我们七个人的小家庭中,无论大小事情,都是由母亲一个人说了算。

结婚后,母亲就向父亲明确提出了“男主外女主内”的家庭经营模式: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,叫父亲不要插手;父亲工作上的事情,母亲也保证做到从不插嘴,并叫父亲安心心去大队忙他的“公务”。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,不掌管家庭经济“大权”的父亲,于是便成了人们口中的“耙耳朵”。

我经常听见与父亲同辈的男人叫他“耙耳朵”,当然,父亲也不甘示弱,同样会反过来叫对方“耙耳朵”。但他们并不生气,反而还显得特别高兴的样子。每天被别人当“耙耳朵”叫喊,好像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。

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,但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,是全生产队女性当中唯一一个一等劳动力。种田、耕地、养猪、喂牛、挑柴、煮饭、洗衣等等,每天的农活及家务事,常常累得母亲喘不过气来。大多数时候,母亲每天晚上还要忙到深夜才能休息。但母亲却从未喊过一声苦,叫过一声累,总是将家里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,并将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抚养长大。

在归工分的那个年代里,父亲将靠“任职”换取的那点工分兑换成薪水,然后如数上交给母亲。年年如此。

记得有年临近年关的一天晚上,只见母亲将年终结算归回来的由一角、二角、五角,一元、二元、五元、十元等不同面额组成的总数不到一百元的所谓的钱,数了一遍又一遍,像永远都数不够似的。看着母亲

数钱那个专注的眼神,我们兄弟姐妹们也争先恐后从母亲手中抢过钱来,每个人都要轮流帮母亲数一遍,直到我们数出来的数字与母亲数出来的结果完全相等之后,再把钱交回母亲手中。每次看见母亲数钱时那愉快的心情和她脸上露出的那灿烂的笑容时,我们也感到特别开心。

记忆中,父亲有一个仿皮的钱包,里面全是角角钱、块块钱,总数加起来不超过十元,那是母亲给父亲下乡不方便回家去老百姓家吃饭准备的生活费。父亲是一般不去老百姓家吃饭的,主要是怕给老百姓增添麻烦,有时候即便饿了,宁愿省去中午那顿饭不吃,也要等到晚上回家吃。所以,父亲很少动用那笔钱。到了年底,父亲基本上又原封不动地把钱包里的钱,如数交还给了母亲。后来,父亲就干脆不揣钱包出门了。

农村改革开放田土下户之后,农民也不再归工分了,父亲的“年薪”也涨到了大约每年三百元左右。父亲依然没有忘记将那份微薄的薪水如数上交给母亲,母亲同样是将那不多的钱数了一遍又一遍。我们也同样以帮母亲数钱为由,抢过母亲手中的钱,同样也是数了一遍又一遍,直到整个房间欢笑声响起……

父亲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那些年,有来找父亲盖章的,也有家庭夫妻之间吵架或闹离婚找父亲调解的,还有因田地角发生矛盾纠纷找父亲断道理的……基本上每隔三五天都会有一拨,有时一天接二连三的也有。那些年,我们家虽然同样穷,但母亲一直把来家里找父亲办事的老百姓当做“客人”。他们来我家若是刚好遇到饭点的时候,母亲是一定要挽留他们吃了饭后再回去。于是,很多老百姓都说,像父亲这样的“耙耳朵”,还应该多有几个。父亲每次也只是笑而不答。

如今,为我们兄弟姐妹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,不仅疾病缠身,还成了半失语状态,行走也不是很方便。好在,母亲的思维意识还是比较清晰的。

父亲不仅接过了母亲的锄头,也接过了

了母亲的锅铲,还接过了母亲的“家当”。按照父亲的话说,前半辈子,母亲将一家人的生活照顾得妥妥的。如今风水轮流转,也轮到该他照顾母亲的下半辈子了。父亲还说,他年轻时欠母亲的太多太多。还好,母亲留给了他“还债”的机会。

父亲在大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父亲在母亲面前,虽然当了半辈子的“耙耳朵”,但在工作中,父亲从未掉过“链子”,也从未让母亲失望,先后数十次荣获县、乡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,并多次当选过县党代表和人大代表。

值得父亲骄傲的是,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周年前夕,父亲将荣获的“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”领回家之后,非常“懂事”的首先将“纪念章”交给了母亲。母亲双手捧着父亲的“纪念章”,仔细摸了又摸,看了一遍又一遍,老泪终于还是没有忍住。母亲那兴奋激动的样子,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获得了奖状没有任何区别。母亲用那半失语的话,颤颤巍巍地夸起父亲:“你这个老不死的,还得行嘛……”母亲的话还没有说完,很快就又笑起来了。父亲的“纪念章”,有父亲的一半,也有母亲的一半。

如今,儿孙们每次给父母的钱,同样要先经过母亲的手,母亲接过钱,仍然要数一两遍之后,再才把钱交给父亲,并说,这两千块是谁谁拿的,那两千块又是谁谁给的等等。每次看母亲数钱的那个场景,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小时候母亲数钱,不同的是再也没有一角、二角,一元、二元……的面额了,全是“一片红”。

我曾问过母亲是不是不相信儿孙们给的钱,还要再亲自数两遍。母亲说,她只是想找回当年数钱的那种感觉。或许只有经历过苦日子、穷日子的人,才能体会到那时贫穷的滋味。也难怪母亲每次都要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。

父亲虽然当了半辈子的“耙耳朵”,但父亲是幸福的。

如今,再也没有听见有人喊父亲“耙耳朵”了。



菜地里的对话

□张春燕

那个雨后初晴的夏日,我暂居的山区小镇天宇明净,空气清新,泥土松软,蝉儿的歌声高亢、明亮又富有激情。我和家人沿小镇边一条溪流转了一大圈,返程途中,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通向背阴、清幽且有几分神秘的林间菜地。寻幽探奇心理驱使我们舍弃大道,奔小路而去。

穿过包谷林,走向菜地,排在最前面的四季豆架挡住了我们的视线,但前面的说话声豆架们挡不住。谁在这山前的菜地里说话?难不成有几个人在干活?那话是说给对方听?还是说给庄稼听?抑或是说给有可能出现的野狗、蛇、松鼠甚至野猪等动物听?一群人热热闹闹在地里干活的劳动场景,我已好久不见。好奇心给我的脚板注入了动力。

走过四季豆架方阵,却不见想象中的几个人,只有一位40多岁的女子,戴着棉纱手套,在躬身拔草。她把头发挽起来在脑后,穿着一身黑红相间的运动套装,看上去整洁干练。她手脚协调,动作干脆利落,很有韵律感。

声音是从田埂上一个小型音乐播放器里出来的。我问她:“是你在听书?”“是啊!一个人做农活太枯燥,听点书或者音乐就好多了。”她停下手中的活,抬起头,脸上洋溢着笑意。那是一张涂过防晒霜、泛着红润光亮的脸,与印象中农村妇女黧黑、干燥、多皱的脸大不一样。

她正在听梁晓声的长篇小说《人世间》。一男一女两位主播根据小说角色和情节设定,变换出不同的声音。怪不得远远听上去,像几个人在说话。

“感觉你很享受边劳动边听书的过

程啊!”眼前的场景,让我来了兴致。

“平时家务多,上有老,下有小,难得有时间看书,只要一个人干活,我都会听点新闻、听点书、或者听点音乐。虽然做起事情来有时听不完整,但总能得到些乐趣,淘点见识。”

聊天中,我了解到,她以前在浙江打工,是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。家中二孩出生后,她跟老公说好,老公继续在外面打工,挣点儿活钱,自己回家照顾老人孩子。现在,公婆都快满80岁了,两个娃娃,大的男孩读初中,小的女儿刚上幼儿园。她在家做家务,管管孩子的学习,有时也去小镇鞋厂上班,再忙里抽空种点菜。

在外面打工的时候,她的大娃交给老人带,老人没文化,不懂教育,还就溺爱孩子,娃儿特别调皮、任性,在学校成绩和表现都不够好。班主任在微信里跟她交流,对孩子的现状和未来有几分担忧。她回来以后,经常跟老师沟通,学校和家庭都对孩子多一些督促和引导,平时自己有空也读书、听书,不刷那些无聊的短视频,给孩子做个榜样。娃儿成绩有了明显上升,表现也好了不少,看起来更加快乐阳光。“那天老师打电话给我,表扬我娃儿进步大,当上了体育委员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她眉宇间一层层向外绽放着开心,整个人神采飞扬。

“看得出来,你是有文化有见识的。”我由衷地赞美她。

她告诉我:她当年读书的时候,成绩还不错,期待着通过考学,实现走出大山的梦想。但那年高考期间,她意外生病,上吐下泄,考得一塌糊涂。当时家里穷困,父母本来就不赞成一个女孩子读太多的书。她只好外出打工,十几年里,她看到也体悟到了外面世界太多的精彩与无奈。她对自己几年前回到家乡的决定感到很欣慰:“这样做,也是为了让娃儿以后更有能力去外面的世界打拼。”

“我现在觉得,走出大山不光是靠双脚,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智慧、靠眼界。有了这些,在万物互联互通的时代,就是待在老家,也一样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”

她的家乡小镇,现在是国家旅游文化名镇。到了夏天,全国各地的候鸟群都到这里来休闲纳凉。避暑经济的发展,为小镇人提供了致富和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。她家里有一层楼租给了4家避暑客,其中有一对退休的大学教授夫妇,暑期带着孙子到这边生活。他们让孙子跟她到地里摘南瓜、掰包谷、掐小葱,到山坡上识别各种野花野菜。他们也教她儿子英语,帮孩子改作业。几个小孩在一起玩得很开心。山里山外的世界,在孩子们的奔跑和欢笑中,自然畅快地连接起来。

走的时候,我们提出想买她一些蔬菜。她很爽快地给我们摘了四季豆、生菜和西红柿,告诉我们,这是百分之百的绿色食品,放心吃。